

李锦论道



要从国家设计层面抓实体经济发展

——六十六评发展实体经济



今年3月份我国新增贷款达1万亿,创14个月来新高,预示着一轮新的投资高潮到来。然而,中小企业仍然资金高度紧张,温州又有60户企业外跑。种种现象显示,实体经济并没有出现由虚变强的征兆。

对实体经济重视已是举国上下形成的共识,然而怎样发展实体经济,始终缺乏整体的设计,也缺乏终极衡量标准。

为什么实体经济越抓越虚

近日,连续有几条彼此不和谐的新闻,引人注意。

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果然,3月人民币新增贷款为1.01万亿元,创下14个月以来的新高。然而,我们看到的另一条新闻是,温州企业没钱还账,一二月新出走企业60家。

还是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不让房地产调控出现反复。此前,国内知名财经评论员呼吁实体经济接近崩溃边缘,要依靠楼市来发展实体经济。

事实上,这种不和谐的状况已经延续三四年了。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采取了各项针对性措施,如增加4万亿元投资、出台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综观这些措施,其着力点都落在保护、发展实体经济上。然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现一种失衡的趋势。结果是实体经济越来越弱,虚拟经济越来越虚。似乎动机与效果不统一,更有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拿出的钱越来越

越多,导致疯狂炒卖地皮和房屋,使房地产“火”气冲天,使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过分“虚化”。当然,金融市场运行中一些独特的制度性设计,也会从技术上导致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与失衡,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两者之间呈现出发散性关系。

不可否认,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出现发散性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最终决定着虚拟经济可能达到的规模或程度,当两者之间的发散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金融可能通过极端的方式重新实现“收敛”。而这种较为极端的方式就是实体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是目前这种状况。

现实地看,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此起彼伏的经济金融危机,不仅使得很多刚刚打开国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遭遇了很多灾难性的损失,而且也对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集中表现就是始于2007年8月的次贷危机。在这场次贷危机中,中国遇到的灾难性损失,目前表现为实体经济危机,连续五个月经济下行便是证明。

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着眼,我们的教训在于:第一,缺乏法律、监管以及会计制度等基础设施建设,实体发展缺乏良好的制度条件,金融这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未起促进作用。第二,对于虚拟经济,没有关注其总体规模的适度性以及潜在的破坏性,避免盲目追求金融发展,使其在短期内过度膨胀,危及实体经济的稳定性。第三,缺乏动态判断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把握良好的宏观调控节奏,导致越调控事态越向相反方向发展。

抓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总枢纽

我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成长于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体制惯性的制约。就企业而言,在法制建设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相关法律法规的形成和部门法规的制定,这就使得这些法律和法规成为相关部门“争权夺利”相互妥协的产物。甚至,各相关部门各自制定出了自相矛盾的法律和法规,使企业等机构无所适从。与双重体制并存相对应,政策也在两种状态中变动。政策取向和落脚点的不断变动,既打乱了人们的预期,也使许多

部门和机构难以适应。由于市场的力量难以抵消政策的强烈影响,政策出台常常出乎人们意料,具有很强的人为性,人们在进行市场运作的同时不得不密切关注经常变化的政策,所以,中国的实体经济被称为“政策经济”。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虚拟经济的发展。

体制问题、政策问题说到底观念问题。当前,在发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过程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把虚拟经济等同于泡沫经济。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对国民财富的增长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泡沫经济是由虚假的高盈利预期和过度的投机行为带动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表面化的交易活动相当活跃,而内在化的物质生产却呈停滞之势,只是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二是把目前业已存在的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归结为虚拟经济。实际上,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是由国企改革不到位、生产效率低下等实体经济因素造成的。因此,将造成不良资产的罪魁祸首归结为虚拟经济,也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三是迄今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脱节,投资收益是以其企业亏损为前提的。因此,仍有一些人不在意实体经济的发展。

顶层设计的基本要素

从更高层次和更长远来看,未来的实体经济及影响其发展的金融改革更需要关注什么?

回望上半年实体经济讨论,关注顶层设计的人甚少。从两会前后有关银行“暴利”的争议中,我们已明显感到了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尤其是涉及到部门职责和利益,难度极大。

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只是具体落实实施方案。譬如,让银行部门到温州抓金融改革试验,很难相信最终会形成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决策。

首先,研究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为其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从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的角度来对待和研究虚拟经济的发展规律,认真研究国外发展虚拟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把规律上升到理论层次,党的十八大报告似应明确提出:“中国须长期恪守实业立国策略”,“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以有利

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为标准,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和谐发展”。

其次,把实体经济发展作为立国之本,把实体经济做强,把虚拟经济做实。虚拟经济发展取决于实体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与其细胞——企业的活性。“中国制造”仍将是我们长久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战略重点是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设计时要以新技术产业、高增长产业、有发展优势的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为对象,为其提供虚拟化支持。再是实施中小企业发展的资本虚拟化战略,开创中小企业融资的新思路。非公有制36条实施细则的出台,显然是当前重中之重。

再次,明确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基本目的。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带来效率的改进,满足企业的真实消费需求。无论金融发展程度达到多么高,经济虚拟化程度如何深,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标准是不会改变的。金融管理的目的之一,是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部门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再之,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相关金融改革。坚决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金融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预;放宽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国家控制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其他的小金融机构的股权应逐步转让;同时放宽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的种种限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作用,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

最后,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推进实体经济改革动态的调控制度建设。建立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当前急需的是建立与宏观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挂钩的动态拨备制度,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增长;更重要的是建立“逆周期”的利润调节机制。建立虚拟经济演变成泡沫经济的预警机制。从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落实。

中国经济的确到了转型的紧急关头,改革办法与措施已经很多,是需要从国家的顶层设计上下大力气了。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旭红观察



国企利润到底跑哪里去了?



徐红

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出,将国企未来两年的利润拿出来,向中国全体国民发放4万亿元“消费券”。

免费的午餐?4万亿元,分给13亿人民去消费,人均约3000元,可以“挥霍”一下。甚至有人建议,把石油补贴的钱补给农民。

“午餐”很显然来自于国企利润分配。如此热点关注可以看出,公众普遍对国企利润的分配产生了疑问。那么,国企利润到底跑哪里去了?

暂且不说这些提案可行与否,先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1994年至2007年间,国有企业基本上上缴利润;2009年,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为6%。有学者分析认为,从1998年至2005年,国有盈利企业盈利额合计近5万亿元之多,但没有上缴国家财政作为国民的公共开支,国企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实现扭亏为盈,但与回馈社会、上缴利润进行国民收入二次再分配的部分却不成比例,国企应加大分红,让全民受益。

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利润的分配制度在不同的阶段是不同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分配体制,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全额上缴,然后再从国家财政那里获得投资以及弥补亏损所需的全部资金。期间曾先后实行过企业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分成制度,但留利占实现利润比例极低。

1978年开始进行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扩大经理层的经营自主权,并允许企业保留利润。利润越高可留下更多的利润,部分可以用于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随后于1988年开始进行税利分流试点以及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从2008年开始,财政部会同国资委明确要求中央管理的一级企业分类上缴利润。

2010年,所有中央企业利润总额为11315亿元。中央企业实现利润分配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上缴所得税25%,归属少数股东约25%,企业法定留存约25%,最后剩下的25%才是母公司可以支配的利润,约为2800亿元。由此测算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只有数百亿元。

也就是说,中央企业的利润总额能反映央企的经营状况,并不说明企业就能拿到这么多真金白银。扣除所得税、归属少数股东收益以及法定公积金等,母公司可支配利润仅有利润总额的1/4左右。而且也应看到国有企业通过垄断获取高额收益的时候,忽视了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政策调控而产生损失的情况。当然还有国有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是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

随着改革与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部分大型中央企业盈利能力与日俱增,有的年利润超过千亿元。当然,以2010年为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后,央企仍结余2000多亿元,这些钱又是怎样的呢?

据调查,这些利润主要用在以下四个方面:解决企业历史负担,弥补国有资本金投入不足,扩大再生产和投入科技创新。

近年来,国有企业承担了企业办社会、冗员安置、离退休人员统筹外负担等巨额费用,仅厂办大集体人员安置就需要1000亿元左右。

目前,半数以上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65%,尤其是航空、发电、军工等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远高于国际公认水平。同时,中央企业也担负着国家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发 展重任,所需固定资产投资巨大。比如石油后续资源勘探接续、电网建设和改造等,每年都需要大规模的投入。此外,中央企业在推进国家重点科技专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也需要投入。

问题是,央企利润既然都用在正途上,为何公众还会产生质疑呢?国企利润到底还应如何分配?

2011年全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净利润169326亿元,按照国务院规定,上缴税后利润比例最高的中国烟草等企业,最高为15%,世行建议“如果有企业50%的利润纳入财政预算,就能使对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增加85%。”

显而易见,国企利润带给公众的共识是过多地用于企业自身的发展,民众认为其弱化了国企经营目标的“公共性”。国企分红应扩大民生分配的比例,还利于民。这才能既保证国家的国有资本需要,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需要。

众所周知,国企的出资人是全国人民,那么公众享受投资收益即国企利润大幅增加的福利也是顺理成章。

然而,目前国企红利主要流向国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国有经济,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于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农村建设等关系民生的领域。

观察人士认为,通过国有资本收益增加国家财政,以公共支出的形式支持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事业,如弥补数额庞大的养老金体系缺口、支持政府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等,可以引导民众减少预防性储蓄,刺激消费信心,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分红是一个长期命题,其核心是如何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这同时也关系到国企的激励和经营的自主权问题,分清利润的性质,区别性上缴,才能既保证国家的国有资本所有者收益,又能保证企业充分实现自主经营权,使管理者更注重成本控制与收益提高,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改善和提升,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资委把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作为央企改革发展目标。尽管从目前央企的经营状况看,利润总额增长得很快,但绝大多数央企盈利能力不强,需要资金支持提升核心竞争力,参与国外市场竞争。此外,央企重组目标仍未达到,实施过程中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综上所述,国企利润分配已经在向民生领域倾斜,其使用惠及人民。至于具体使用问题,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国企红利分配政策调整可以在国有资源收益金上进行操作,而不必整体变动上缴比例。同时试行专款专用,逐步建立国企红利收支管理体系,做好相应的法规管理和计划管理。

吴英与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之异同

——六十七评发展实体经济

孟书强

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变革就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前人没有碰到的问题,如何合情合理地圆满解决这些新问题,考验着我们的能力和智慧。

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勇气,冒着极大的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自此以后,小岗村几乎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每当改革遭遇困境与不顺时,人们总是忍不住回望34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忍上。

诚然,吴英案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吴英是犯罪之人,目的是个人暴富。在我们看来,人们关注吴英案,其实质是关注吴英案背后的民间借贷之困,这方面与小岗村18位农民有相比之处。

鉴往知今,厘清吴英案与小岗村的同与不同,对我们更好理解吴英案背后的民间借贷体制之困,理解改革再出发的路径都具有现实意义。

吴英案与小岗村之同

小岗村与吴英案有众多相似之处,才引得人们在谈论吴英案时不时提到小岗村。

首先,两者都是社会变革期具有普遍意义的热点话题。小岗村改革之时,10年浩劫刚刚过去,人心思变,领风气之先的小岗村引发了人们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热议,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吴英案发前,中国的民间借贷已经颇受关注,仅2010年,浙江省

就查处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吴英案发则直接将这种关注推向了高潮,民间借贷成为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

其次,两者同样都面临着体制之困。在1978年的中国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彼时的宪法规定:“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贸然实施“大包干”是冒着坐牢的危险的。民营企业吴英同样面临着体制之困。作为民营企业,吴英几乎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从亲朋好友处借贷成为其经营资本的主要来源,而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触碰到法律的红线——民间借贷的合法与非法在我国法律中的界限并不明显。一句话,小岗村与吴英都面临着政策滞后的体制之困,在某种程度上其行为都是被逼无奈之举。

再次,两者都引爆了变革的引线。1978年小岗村的大包干,引发了中央的重视,并最终在全国得以推广,可以说是,小岗村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如今,备受争议的吴英案同样引发了人们对现行金融体制的反思,给予民间借贷合法性成为主流民意。3月28日,国务院宣布,将在温州市设立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我们不能说是吴英案引发了这一方案的实施,但这一方案能够如此之快的得到中央批准,谁又能否认其和吴英案之间的关联呢。

吴英案与小岗村之异

小岗村与吴英的不同之处并不比其相同之处少。弄清两者的不同,有助

于我们更好的思考。

第一,两者所处的言论环境不同。小岗村人试图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时,人们还习惯于听从来自上面的指令。除了上级党政部门,很少有人公开对小岗村的行为公开发表意见、表达观点。在价值多元、言论日益开放的今天,吴英案发后,人们借助媒体开始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有学者直接上书中央表达对于浙江法院审判结果的不满与反对。这在1978年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为吴英说话的人比当年为小岗村说话的人要多得多,这也让人们对吴英案的合理解决多了一份期盼与想象。

第二,两者对他人的影响不同。小岗村的大包干在很大程度上是提着自己的脑袋搞改革,吴英案则是在自己冒险的同时,也把向他借贷的人置于风险之中。小岗村的改革如果失败,受害的顶多是小岗村村民自己。然而,由于缺乏应有的监管,吴英的民间借贷一旦崩盘,则可能引发一连串危机,乃至影响到当地社会稳定。这大概也是吴英案比小岗村更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第三,两者的代表意义不同。小岗村人当年实在是出于生存所迫,不改变,等待他们的就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只能是死路一条。换言之,小岗村人大包干代表的是当时人们本能的求生欲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出身农家的吴英则是社会底层自力更生、努力打拼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她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承载着草根阶层的暴利梦想,她经商的方式和方法都已走向另一极端。